

# 古今中西会通视域下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理论阐释

——读蒋永福《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

孙 儒

**摘 要**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一书在中国历史语境、东方思维和古今中西比较的视域下,对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史实描述,尤其是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进行了较全面的分析和阐释。作者利用古今中西会通的思想方法,以古论古,以古鉴今,为我们呈现出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整体脉络,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做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参考文献7。

**关键词** 图书馆学 中国古代 理论阐释 中国的图书馆学

##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of Library Science of Ancient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Western Fusion

——Revelation of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 of Ancient China* by Jiang Yongfu

Sun Ru

**Abstract:** In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 historical context, oriental thinking and the comparison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Chinese and western perspective, the book *Research on Library Science of Ancient China* describes the historical facts of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Chinese ancient library, especially makes a more comprehensive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thought of Chinese ancient library science. Using the ideological method of fusion between ancient and modern China and China and the West, the author discusses the ancient with the ancient and learns from the present, presents the overall context of the thought of Chinese ancient library science for us, and make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contribution to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7 refs.

**Keywords:** Library Science; Ancient China; Theoretical Interpretation; Chinese Library Science

自1925年梁启超在《中华图书馆协会成立会演说辞》中提出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以来,“中国的图书馆学如何建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思考。然而,由于种种原因,我国图书馆学界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中国图书馆史”领域,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果,而在“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体系”研究方面的成果乏善可陈。目前王余光先生申请的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图书馆学史”最终成果尚未出版问世,令人期待。这种情况下,蒋永福先生所著《中国古

代图书馆学研究》<sup>[1]</sup>一书的出版,适时填补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体系”研究成果的缺失,值得欣喜。

### 1 古今中西会通:立意及思想方法

中华民族文化传统源远流长,而且中华文化相比于西方文化,有着迥然不同的“东方思维”特质。正如钱穆先生所说:“中国是一个文化发展很早的国家,……中国因其环境关系,他的文化,自始即走上独自发展的路径。……中国文化不仅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中国古代官修图书的学术文化贡献研究”(项目编号:20CTQ002)阶段性研究成果之一。

比较孤立,而且亦比较特殊。”<sup>[2]</sup>因此,作为中华文化重要组成部分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应具有同样的特性,即产生很早且走上独自发展的路径,比较孤立和特殊。

然而,自西方国家近代工业革命以来,其工业化水平与科技水平迅速居于领先地位,并开始了扩张与殖民世界的历程。面对西方世界的物质文明成就,不少人不自觉地掉入“西方先进”的思想陷阱中无法自拔,忽视甚至否定了古代中国优秀的实践智慧和思想智慧,其中就包含着古代图书馆实践智慧和思想智慧。从这个角度来看,在全球化时代和中西交流的社会背景和学术环境中,我们在梳理、归纳和阐释古代中国人的图书馆学思想智慧时,除了要客观描述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演变历史,并适当借鉴西方学术话语体系之外,更应从精神层面的高度,聚焦中国古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产生及发展的东方思维特质和历史语境,在古今中西会通的视野下,充分挖掘古代中国人的图书馆学思想智慧。

蒋永福先生所著《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一书,旨在挖掘古代中国人在图书馆藏书与管理实践背后所蕴含的思想智慧和本土特征。该书通过客观描述中国古代图书馆的产生机制和存在形态,梳理和归纳出古代中国人的图书馆学思想的构成内容,并概括出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若干特征。对当代中国图书馆人而言,择优传承古代中国人的优秀图书馆学思想,就是“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表现之一。为当代乃至未来的中国图书馆人提供史鉴视野和坚守初心、迈向未来的不竭精神动力,这便是该书的立意所在。

该书突破了此前中国古代图书馆史和图书馆学史著述侧重以历代著名藏书家和藏书楼为主要研究对象、且单纯以历时性方式描述古代藏书家和藏书楼演变史迹的史书书写范式,亦有别于以纯粹实证方法建立具有可实践性的真理标准的西方学科式书写范式。

在内容组织方式上,该书不以时代沿革为序,而是按照各部分的主题构成及其层次分门别类地分析和归纳,即不以中国古代图书馆实践和理论的发展进程为序,而是以概念、实践和思想内容的

分析与归纳为纲。因此,该书虽以中国古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思想发展的基本历程为框架视野,但并不命名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史”。

在思想方法上,该书遵循古今、中西会通,批评意识与理性审视交会的思维方式,既不唯古是尊,也不以今勒古、以西框中,而是在古今异同、中西比较的视野中,坦然面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精华与局限,在“同情式理解”中不失批评,批评中又不失理性的“独立自由之精神”。

在这种民族文化本位和古今、中西会通的思想主导下,该书采用“概念→实践→理论(思想)”的结构形式,对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存在形态,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称谓,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与校雠学的关系,中国古代图书馆的藏书与管理实践,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有什么”“是什么”和“如何是”“为何如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特征等问题,展开了深入的概括分析。由此,该书主要包括概念阐释、实践描述、思想分析三大部分,分为“有关史事与概念阐释”“中国古代图书馆的藏书与管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申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特征”等若干主题,各部分之间呈现出“分而论之又贯穿一体”的特点。

## 2 概念阐释:中国历史语境下的独立审视

该书在讨论中国古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是否存在问题、称谓问题及概念阐释时,始终贯穿“中国历史语境”这一史实前提,以此分析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内容构成及其精神特质,始终把握言之有据、言之有物、言之有理的方向逻辑。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该书从中国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民族性特征角度,认为“史官文化是中国藏书文化和图书馆文化的‘母文化’形态,中国古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是作为史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生发和演进的”<sup>[1][1]</sup>。这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发展路径之民族特性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

基于“中国历史语境”,该书对以下几个主要问题进行深刻阐释:

第一,通过论述中国古代史官制度的起源与演

变,提出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员是以“馆职”身份从事图书馆工作的人员,“图书馆员”建制经历了从史官到秘书人员再到馆职人员的演变历程。中国古代馆职人员与西方建制下的现代图书馆工作人员不可完全等同视之,两者在配置方式、考核方式、具体工作内容等方面必然存在差异,这是不同历史时期对馆职人员或图书馆从业者有不同的职责要求所致。

第二,通过梳理中国历史上藏书处所由“藏书楼”称谓向“图书馆”称谓的转变过程,将藏书楼和近现代图书馆根本性质统一归纳为“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的文化设施”,明确提出“藏书楼就是古代的图书馆”<sup>[1](24)</sup>的定论。得出这一定论的根据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尽管中国近代图书馆的形成和发展在体制机制、服务理念、管理方法、技术方法等方面表现出“西来”的过程,并且中国近代图书馆确实无法从古代藏书楼自发演变而成,但是古代藏书楼和近代图书馆均是在中国社会母体中产生,它们作为“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的文化设施”的根本属性是相同的,只不过在收集、整理、利用文献的目的、范围和方式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也就是说,中国古代虽无图书馆之名,却有图书馆之实。二是人类文化的发生、发展是多元并存的,图书馆作为文化现象,也不应该只有西方图书馆之一“元”。中国古代藏书楼作为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的文化设施,已然具有图书馆的根本性质,而且以其独具特色的图书馆形态,成为世界图书馆多元体系中的独特一“元”。

第三,通过申论谢灼华先生承认存在“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观点,驳斥那些否认中国古代存在图书馆学的观点,从而明确指出中国古代存在图书馆学。得出这一定论的逻辑是:某一门社会科学理论的产生,往往是该领域社会实践经验的长期积累和总结的结果,在中国古代社会中,人们对以藏书楼或馆阁形态存在的图书馆实践经验的长期积累和总结,必然产生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理论。那些认为中国古代只有藏书管理经验及总结而不存在理论意义上的图书馆学的观点,普遍犯了认为中国古代只存在校雠学、目录学等文献整理思想而不存在图书馆管理思想的“以偏

概全”、按照现代“学科”定义去衡量古代是否存在图书馆学的“以今勒古”以及以西方学科名称及其理论体系为标准来判断中国古代是否存在图书馆学的“以西框中”的思想方法错误。

第四,通过厘清中国古代校雠学、目录学与图书馆学之间的相互关系,否定目前学界普遍认为是“校雠学”就是中国古代的图书馆学称谓的观点,明确提出“中国古代校雠学是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关联最紧密但不完全重合的一种学问”<sup>[1](46)</sup>。其逻辑是:第一,校雠学研究范围无法涵盖图书馆活动的所有方面,因为在图书馆研究范围里,包括文献收集、整理和利用三大方面,而校雠学主要研究范围不涉及文献利用范畴;第二,校雠学与图书馆学的对应并非“学科”意义上的对应,而是工作内容方面的交叉对应。

第五,该书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时间界限指定为先秦至清末这一历史时段,并在中国文化本位和历史语境下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定义为“研究古代中国人的图书馆实践方法及其思想观念的学问,其内容主要包括古代中国人的‘文献之道’和‘馆阁之道’”<sup>[1](48)</sup>。“文献之道”指古代中国人关于文献的价值、功用的思想观念以及关于文献整理活动的实践方法;“馆阁之道”指古代中国人关于馆阁功用的思想观念以及关于馆阁管理活动的实践方法<sup>[1](49)</sup>。这一定义,充分体现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内涵的民族文化独特性,揭示了古代中国人“价值论与方法论相统一”的思想特点。

综上所述,该书根植于中国古代图书馆学产生、衍变及存在的历史文化语境,利用古今、中西比较与会通的思想方法,展开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存在问题的论证,以及概念内涵的深刻阐释,结论均言之有据、释之有理,而且有更多的独立阐发,对中国图书馆史和图书馆学思想史研究者具有重要的启发价值。

### 3 东方思维: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民族特性

思想来源于实践,因此,该书十分重视中国古代图书馆实践的考察与总结。作者通过爬梳整理中国

古代皇家图书馆、私家图书馆、寺观图书馆和书院图书馆的藏书与管理实践活动的相关史实,采用类似姚名达撰写《中国目录学史》一书所采用的“主题分篇之法”<sup>[3]</sup>,简要勾勒出古代图书馆的藏书来源、藏书散亡、藏书特点、文献典藏、文献利用、人员配置、规章制度等方面的基本情况,为分析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提供坚实的史实依据。

在此基础上,该书认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就是古代中国人对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之事所思所想而形成的意识或观念。”<sup>[1](195)</sup>从该书的论述中可知,文献与馆阁(图书馆)是互为依附关系的。馆阁作为收集、整理文献以供利用的设施,因有文献之藏而有存在价值,文献因藏之于馆阁而被保护和传递利用。因此,文献与馆阁是古代图书馆的主要构成要素,所以该书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内容大体分为“文献观”和“馆阁观”两个方面。其中“文献观”主要包括文献价值观、文献整理观和文献藏用观;“馆阁观”主要包括馆阁功用观和馆阁职任观。

该书在分析总结古代中国人的文献观和馆阁观时,遵循的是古代中国人特有的“东方思维”特征。例如,该书在讨论中国人的文献价值观时,首先揭示中国人具有“文以载道”的思想观念,即文献之中记录有圣人之道,并从信仰角度指出中国人重视文献的观念源于“圣贤崇拜”。因此,中国人将文献的价值描述为“书即道,道即书”<sup>[4]</sup>。这是中国人特有的本体论价值观的具体表现。其次,揭示出古代明主和贤人君子普遍认为文献具有理政治国的教化政治价值。这是中国人“文治”思想的具体表现。再者,揭示出中国人具有把书籍与天地、把读书与人生价值联系起来的思想。这是中国人“天人合一”思维的具体表现。

该书在讨论中国人的文献整理观时,首先指出,如果按照杜定友和刘国钧的从“以读者为中心”的西方现代图书馆理念概括中国古代人的文献收藏目的,具有偏颇之嫌。因为,在中国古人的思维习惯下只能产生“以文献为中心”的藏书楼或馆阁理念,而不可能产生“以读者为中心”的理念。所以,该书认为用“以读者为中心”的现代

图书馆观念去评价中国古代图书馆的是非问题,不符合“逻辑与历史统一”的学术原则。从“以文载道”的角度出发,该书将中国古人的藏书动机概括为“藏书以传道”。这种审视角度,应为学界重视。其次,该书提出中国古人的文献分编思想之基是“阴阳五行学说”、分类之纲的主流是以“经、史、子、集”为序的四分法、归类之法是“以意归类”、类名之称是“字词标识法”、分编之旨是“申明大道”、目录之体分“学术体和馆藏体”、编目之用是“明道之要”与“览录而知旨”、著录的辅助方法是“互著与别裁法”。这些概括均是以“东方思维”为基础的分析总结,与西方目录分类思想迥然异趣。

该书在讨论中国人的文献藏用观时,客观理性地分析古代中国人的文献珍藏与流通观念,以及所处的历史现实情况,认为大多数藏书家既重视文献收藏,又重视文献传播利用。由此作者认为,此前学界普遍认为古代中国人具有“重藏轻用”的文献藏用观是一种误识。客观来看,中国人的文献藏用观应概括为“重藏、重传、重用”。这种认识判断体现出作者与众不同的、敢于发前人未发之言的独立思考胆识,所得出的结论对学界重新认识中国人的文献利用传统具有重大启示作用。

该书在讨论中国人的馆阁观时,同样依据中国人的“东方思维”特性进行分析。作者认为,中国古代的馆阁具有“藏秘书,处贤才”之用,因此,馆阁是以“以书储养人,储养人以治国”为目的的一种文治之器。由此可以看出,中国古代馆阁的功能体现出高度的政治性,与现代图书馆的传播文化知识或信息、提高民众文化素养的功能差别较大,这与古代中国人特有的“文治”思想密不可分。

该书通过论述文献观和馆阁观的基本内容,回答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是什么”的问题,在此基础上,该书进一步阐述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如何是”和“为何如是”的问题,即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产生机制及意义阐释。在回答这个问题时,该书从哲学思维出发,充分揭示了中国古

代图书馆学思想的哲学意涵。具体表现为,该书将中国古人的文献之道概括为“文以载道”、将中国古人的文献揭示之道概括为“揭示文献以明道”、将中国古人的馆阁之道概括为“藏书以传道”。“文以载道”“揭示文献以明道”和“藏书以传道”是中国古人的“价值论思维”特性,以及“天人合一”“道器合一”哲学思想的具体表现。因此可以认为,“文以载道”和“揭示文献以明道”是古代中国人的文献哲学之精义所在;“藏书以传道”是古代中国人的图书馆哲学之精义所在。

综上所述,该书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概括分析,紧紧围绕中国古人的“东方思维”特性进行归纳和分析,论述内容既有理论总结又有实证考辨,既有语境还原又有价值重估,充分体现了作者对中国历史语境的理性关照,所得出的结论具有客观、理性、全面的优点,其思想理路和结论颇为新颖可观。

#### 4 纵横比较: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宏观特征

该书在阐释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相关概念、梳理中国古代图书馆藏书与管理的实践历程、论述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本体、申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发生机制及意义后,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宏观特征进行概括,作为全书的尾论。作者在概括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特征时,是从“古今中西比较”的视角展开的,即“以中西学术思想的迥然差异为背景,在中国图书馆学与西方图书馆学、古代图书馆学与现代图书馆学的双重比较视域下概括的宏观特征”<sup>[1](439)]</sup>。由此,该书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的特征概括为三大方面:

一是历史特征,表现为悠久性与自发性。中国古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思想生发很早,在几千年的发展过程中保持着逐渐兴盛的态势,表现出悠久性与连续性。该书认为,这种悠久性与连续性是在完全自发状态下形成的,即“未受异域文化影响”。诚然,在中国图书馆学发展历史上,异域文化影响最显著的莫过于汉唐时期佛教传入而形成的寺院图书馆和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后西方文化的渗透。但是这些异域文化并未

使中国古代图书馆的发展路径产生根本性改变。所以,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是土生土长的“中国的图书馆学”。所谓“自发性”亦可称为“本土性”。正因这种本土性特征,中国古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与西方相比,在藏书及利用的观念、文献分类方法、书目提要类型、版本鉴别思想等方面均表现出明显的本土化特征。

二是思维特征,表现为本体性与价值性。该书认为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具有本体性思维特征,本体性思维的表现是在终极意义上或整体意义上去把握事物的本原及本质属性,其特征是不分主客的整体直觉或直观把握,与主客二分的分析性思维迥然异趣。此外,该书认为古代中国人对文献和馆阁意义的把握是一种价值性把握,中国古人在“天人合一”的整体性思维框架下,是从人生价值论角度把握文献和馆阁的存在意义的。由此可见,作者是从古代中国人的整体性思维与西方分析性思维的比较视野下认识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思维特征的。

三是论理特征,表现为非论证性与非学理性。该书通过分析中国古代丰富的图书馆学思想成果,总结出两个特点,即“从研究结论的得出方式看,许多是‘直接定论出来的’,而不是‘论证出来的’,此即非论证性特征;从论述的逻辑方式看,大多为就事论事、具体而微的经验总结性描述,而不进行‘假设—论证—结论’或‘大前提—小前提—结论’或‘公设—证明—公理’等形式的学理性论证,此即非学理性特征。”<sup>[1](446)]</sup>其中所提到的“论证出来的”研究方法和“大前提—小前提—结论”等形式的学理性论证方式,都是西方分析思维中的科学研究方法。由此可知,作者是从与西方学术研究的“论证性”和“学理性”相比较的角度来总结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论理特征的。

综上所述,该书概括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特征,是从古今、中西思维方式的比较中概括出来的。这种古今、中西比较的研究方法,使得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本土性特征表现更为清晰,对读者准确地理解中国土生土长的图书馆学思想有很大助益。

## 5 学术价值与启示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的问世,具有重要的学术文化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推进了“中国的图书馆学”建设进程。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先生和刘国钧先生先后提出了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和“合于中国国情之图书馆学”的设想。但是,由于受到历史和时事的影响,建设“中国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进程并没有顺畅地推进,相关研究工作呈现“断断续续、零星分散”的特点。进入21世纪,“图书馆学本土化”“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建设”等议题接连涌现,但尚未形成燎原之势。综合此前的研究成果来看,专门的、完整的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成果尚未出现。《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的问世,填补了这一缺失。该书在古今中西会通的视野下,挖掘、梳理和归纳出中国人按照自己的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所实践和建构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的建设进程。

第二,促进了世界图书馆学理论多元化发展。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的图书馆学理论建构理路是遵循西方现代图书馆学理论模式进行的,世界图书馆学理论几乎形成了西方话语主宰下的“一元化”局面。正如傅荣贤先生所言:“近百年来中国图书馆学步趋西方的一个直接结果是,在世界图书馆学界很难找到‘中国制造’的有影响的概念、理论、学者和学派。中国声音的孱弱,令人怀疑‘中国’在世界图书馆学层面上的存在意义。因为,有或没有中国,对世界图书馆学的进步似无任何影响。”<sup>[5]</sup>这种局面的形成,主要与我们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研究不够有关。《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的问世,有利于打破西方话语主宰的图书馆学理论“一元化”的局面,让世界听到“中国声音”,让中国图书馆学思想成为全世界的宝贵财富,促进世界图书馆学理论多元化发展。

第三,为进一步挖掘和传承中国本土的优秀图书馆实践传统和思想传统提供理论参考。近年来,学界对中国本土的图书馆史、图书馆学思想史和学术史研究的重要性认识愈来愈深,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出现,成绩喜人。无论是图书馆史研究、图书馆学思想史研究,还是图书馆学学术史研究,

都以挖掘和传承中国本土的优秀图书馆实践传统和思想传统为主要目标。《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一书对中国古人的图书馆实践智慧和思想智慧进行了较全面地梳理和总结,是学界进一步挖掘和传承中国本土的优秀图书馆实践传统和思想传统的重要理论成果。此外,《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一书所整理、引用的史料十分丰富,加之作者所采用的“主题分篇之法”,使得该书呈现出与古代类书相似的古代图书馆学领域的资料汇编属性,可以为学界进一步挖掘和传承中国本土的优秀图书馆实践传统和思想传统提供文献资料参考,亦可为研究人员指引治学门径。

第四,有助于增强当代中国图书馆人对本土图书馆文化的自觉、自尊与自信。增强文化自觉、自尊与自信是当代中国人坚定地继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前提。作为图书馆人,正确认识中国本土图书馆文化至关重要。研读《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一书,可帮助人们充分了解中国古人所创造的极具中国特色的图书馆实践智慧和思想智慧,充分认识到其中很多实践方法和思想观念至今仍具有重要的借鉴、启发和指导意义,深刻感悟到古代中国人为世界图书馆和图书馆学做出了其他民族不可替代的独特贡献。

通过阅读《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一书,联系我国图书馆实践与理论发展实际,可以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应加快推进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中的中国图书馆思想史课程建设。中国古代图书馆思想史是图书馆学专业学生应该掌握的基础知识,对图书馆学专业学生构建完整的学术思想体系至关重要。但是,目前国内开设图书馆思想史课程的高校,其课程设计和所用教材并不尽如人意,尤其是至今仍无具有指导意义的国家规划类“图书馆思想史”或“中国古代图书馆思想史”的专用教材。笔者认为,这与此前图书馆学领域缺乏系统性的中国古代图书馆思想史理论研究成果有关。《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作为与中国古代图书馆思想史紧密相关的研究成果,可为今后编写通论性中国图书馆思想史教材提供重要参考。因此,学界应以此为契机,参考《中国古代图书馆学

研究》及其他重要相关研究成果,加快推进编写中国图书馆思想史教材,进一步完善图书馆学专业教育中的中国图书馆思想史课程建设。

第二,青年学者应培养“脚踏实地、博学通闻”的读书治学观。通读《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不禁感叹于作者蒋永福先生所采用的古今中西会通、批评意识与理性审视交会之思想方法的“独立自由之精神”,以及论证过程中旁征博引大量古今中西文献资料和思想观点的博学多识。笔者认为,这部观点新颖、资料丰富、体例完整、论证科学的著作的问世,与作者蒋永福先生“蓄极则通”的读书治学观<sup>[6]</sup>紧密相关。在这个阅读习惯娱乐化、碎片化特征明显的时代,青年学者在读书治学过程中容易形成过度自我、过度实用主义的狭隘的读书治学观。这种狭隘的读书治学观一方面不利于青年学者个人的健康发展,另一方面助长了学术研究领域的“浮躁之风”。因此,青年学者应该克服过度自我、过度实用主义的狭隘视域,培养“脚踏实地、博学通闻”的读书治学观。一要树立志存高远、存心养性的读书志向;二要坚持勤阅读、多思考的读书习惯;三要注重博约相济,追求会通。正如张舜徽先生建议学习文史的青年“有必要恢宏志气,将治学范围推广,博览兼收,务求通贯,必通贯而后能免于舛陋”<sup>[7]</sup>。如此则一方面可以使青年学者在读书治学中不以物累、不因境迁、久久为功;另一方面有助于逐渐改善学术研究领域的浮躁局面。

第三,应重视中国本土化图书馆学思想的研究与传播。虽然“图书馆学本土化”“中国特色图书馆学建设”等重要议题提出已久,但是从现有研究成果来看,图书馆学界从事相关领域研究的学者数量可谓十分稀少,其中青年学者的数量更是少之又少。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不免会造成“图书馆学本土化”研究事业难以为继的危机。因此,笔者认为,我们应该重视开展中国本土化图书馆学思想的研究与传播工作,鼓励更多学者参与到相关领域研究中,形成可持续的发展局面。《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的问世,将对我国图书馆学本土化研究的深入发展,产生引领和示范的作用。

## 6 结语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一书在“中国历史语境”、“东方思维”和“古今中西比较”的视域下,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和图书馆学的存在问题、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内容构成问题、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产生机制与意义问题和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的特征问题进行了全面的分析阐释,是目前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的一部系统性的理论著作。该书始终贯穿“古今中西会通”的思想方法,视野开阔、资料丰富、论证有力。正因如此,该书所得出的结论往往能切入本质,多为前人之所未发。此外,作者敢于纠正此前有关学者对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本质的认识偏差,充分体现了“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学术探索精神。总体来说,该书进一步推进了“中国的图书馆学”理论体系建设,促进了世界图书馆学理论多元化发展,为继续深入开展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提供了理论参考,有助于增强当代中国图书馆人对本土图书馆文化的自觉、自尊与自信。该书所体现的学术文化价值和思想方法启示对学界具有重要借鉴意义,是中国古代图书馆学思想研究的代表性著作,值得仔细研读。

## 参考文献

- 1 蒋永福.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研究[M].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21.
- 2 钱穆. 中国文化史导论[M]. 上海: 商务印书馆, 1994: 1.
- 3 姚名达. 中国目录学史[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5: 自序.
- 4 陈谷嘉, 邓洪波. 中国书院史资料[M]. 杭州: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8: 182.
- 5 傅荣贤. 《中国古代图书馆学史》课程应该教什么[J]. 大学图书馆学报, 2008(3): 63.
- 6 陈丽丽. 蓄极则通: 蒋永福先生谈读书[J]. 图书馆建设, 2021(5): 79-86.
- 7 张舜徽. 切庵学术讲论集[M]. 武汉: 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8: 4.

(孙儒 馆员 哈尔滨师范大学图书馆)

收稿日期: 2021-12-01